



新观察·年度综述

梳理2012年的散文创作,本来凭印象以为平平的图景,突然跳荡起来,有了色彩,有了热度,有了笑语喧哗,让我想起了辛弃疾《水龙吟》的一句好词:“水随天去秋无际”。只有认真读了才知道,2012年文坛确实是收获了一批有分量的散文佳作。

游记佳品进入金色秋天

两年前我曾提到,近年来,随着中国游客人数的迅猛上升,每年所创作出来的游记散文也在急剧增加,但与数量不成正比的是精品甚少。游记精品一般需要具备如下几个特点:一是内容新鲜,独特扎实;二是文字漂亮,诗意充盈;三是见识独到,启人心智;四是学问深厚,予人养学;五是胸怀四海,境界高远。在这5个基础之上的最上等作品,还要能以思想的光芒灿烂古今,典范如范仲淹的《岳阳楼记》。

今年的游记散文终于出现了数篇佳品,尤其出彩的是几篇域外从活式的作品,首推云杉的1.2万字长文《文化的非洲》。《文化的非洲》记述的是作者对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津巴布韦的一次访问之旅。天外边风,异域炫彩,迎面而来的人、物、事、景色、景象、景遇,显然都是新鲜罕见的,有令人目不暇接的纷繁。《文化的非洲》选取了一个绝佳切入点——文化,“芝麻开门”般地一下子打开了陌生国度的大门,把不相知民族的脉搏号住了。于是,理解有了钥匙,对话有了气场,认识有了深入肯綮的路径。我们跟着作者的眼睛,随着作者的思考和发现,逐步认识了埃塞俄比亚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文明,了解了坦桑尼亚对文化和艺术的崇尚,知晓了津巴布韦民族文化的源流以及她的人民是如何以文明的方式对待大自然的。

这些观察、思考和见解,皆以从容不迫的气度,以准确、漂亮的行文,娓娓道来。时有热情似火的句子突然跳出,一下子灼热了读者的眼球,比如:“这只有几十平方米大小的陈列室,可以称得上是记录人类漫长历史的人类共同的祠堂,是今天已有70亿庞大群体的人类的历史。”“人们一说历史,大都会约定俗成地说成历史文化。历史和文化是一对情侣,如影随行。”更有蕴含深刻哲理的警句,让读者感受到发现之美隽永之美:“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又怎么可以知道自己往哪里去呢?”“文化不可以有暴发户。强盗可以把他人的财富据为己有,怎么可以把他人的思想和精神据为己有呢?”

然而,《文化的非洲》的最动人之处,是在于超凡拔群于一般文人的高度——由襟怀的高度、境界的高度、见识的高度而锻造出来的思想的高度。作者博古览今,打通中外,不断由眼前的非洲文化种种,联想着中国文化的不古往今来以及继往的目标、行进的路径、抵达的前景,处处思考着中国文化在世界文明进程中的格局、作用、贡献等等重大问题。“作为有着灿烂文明的中华民族,我们寻根问祖的目光可再深远一些,视野可再宽广一些。除了到大槐树下,到炎黄故里、到山顶洞前去感恩叩拜,还应该走进非洲大陆,走到埃塞俄比亚来,因为这里有我们祖宗的祖宗,有人类真正的故乡。”“世界文化的多姿多彩启示人们,人类共同的文化理想应该是文化的多样化……世界如此之大,谁也不应该垄断地球,纵然是再美丽的花,也不该一花独放。美丽是不可以称霸的,文化也是不可以称霸的。”作品不仅予人以美,给人学识,更能阔人胸襟,提升了作为一个中国人和世界公民所应拥有的崇高的精神境界。

此外,刘上洋的《古巴,那些我没有想到的》也展现了一个不容易去的国度——古巴的历史传奇,为我们提供了现场的种种鲜活信息。

于坚的《在尼泊尔的喜马拉雅》则是另一种调子的游记散文。该文貌似随意,只任凭自己一路走着、看着、审视着、思考着,然后信笔记录下来,实则是于无声处大舍细人,显露出作者大量读书所积累的学识、人生触点和社会见解,还有对小至个体生命,大到整个世界的痛感。很多议论,比如怎样生活,如何挣钱,向何处发展等等,是关于人类本源的话题,直抵人的心底。

82岁的李国文挥笔写就《慈禧躺着也中枪》,初看这个有点先锋味道的题目,以为作者是拿那位千夫所指的叶赫那拉氏开涮。然而,作者真正骂的却是一个叫巴克斯的英国人,因为债务缠身,巴克斯在英国混不下去,到中国来撞大运。他不仅胡编乱造诸多来自中国的“独家消息”,更连抢带偷,得到大量珍稀文物。李国文用大量史实和锋利的笔触,将“英国混混”巴克斯的无耻嘴脸撕个稀巴烂之后,笔锋一转,又不留情地痛骂“我的那些同行”。这是因为,巴克斯之后杜撰了一本《太后与我》,捏造了他与慈禧太后的情色关系,荒唐至极,在当时根本无人理睬,更未出版。然而,2011年,该书却突然大红大紫,“先在香港问世,后在台湾出版,接着,在我们这里,一些见利忘义的文化人,又将这个英国老瘪三从泔水缸里翻腾出来”。李国文一针见血地指出:“《太后与我》的出现,也许不过是一起人想发财而想钱的偶发事件,也许并非反华政客们有谋略的刻意安排,但是西方世界对于中国和中国人的文化骚扰、精神攻势,其实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和时代背景的。”李国文充满正义气概的文章,在当下社会中很少见而又实在需要,充分显示了作者的民族气节和道德底线。

徐刚的《菩提世界》短短2000字,写了一次对艺术家的拜会之行,行文中洋溢着浓郁的书卷气。“以手指蘸水,轻轻一抹,眉纹各异,波光流转,一律美丽,或清纯,或娇媚,或妖艳,或哀怨,或惆怅,若咏者,若歌者,若舞者,若行者,若思者,能想其貌,能闻其声,‘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这种缠绵于中国古典意境中的文字,在当代作家中实在不多见,没有多年手不释卷的浸淫,难得这样的书香。

邱华栋的目光遍及当代世界文坛的最新作品和活跃的作家,他对外国电影和国外流行音乐也能如数家珍,在这三个领域皆有专门著作出版。他的《从斯里兰卡出发》一文,清晰介绍和解读了从斯里兰卡走出来的无国界作家群中非常重要的迈克尔·翁达杰,一一评价了他们的诗歌和几部长篇小说、电影剧本,还为我们介绍了当下活跃在斯里兰卡文坛的其他几位作家,以及西亚文学的发展脉络与贡献,不仅信息量大,而且评价行内,见解独到,令人眼界大开。徐则臣的《孤绝的火焰》是他重读诺奖得主、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作品的感悟。当年他上大学期间读黑塞,迷恋他的诗歌,而今有了十来年的社会经历又已身为人父,则随着黑塞小说中无处不在的巨大激情和精神焦虑,收获了更深的“破解一次次精神危机”的哲学体验。人人都在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成长,然而好的成长,一定是在好书的照耀下才能完成。

可惜的是,这样的好书太多而我们的阅读时间越来越少。当代人的生活日见忙碌,时间永远不够用,以至于我们能见到的读书文章越来越少,能振聋发聩的更少,纯文学作品亦越来越

越少,让远在美国的王鼎均先生专门写出了《文学会不会死亡?》一文。

我坚信,文学不会死亡。但我也焦虑地期待着,希望明年能有更多关于读书的佳作现身。

人物散文令人感动

人物散文一直是散文创作中的一大脉,每年都有佳作。今年我读到的记人散文,有几篇让我热泪盈眶。

贺捷生写她生母的长文《双枪女英豪——1946年,我的母亲蹇先任在围场》,原标题为《骑白马,挎双枪——1946年母亲在围场》。从这个标题的叙述风格中,可以看出贺龙将军的戎马夫人蹇先任这位红军女英雄、八路军英雄、共和国女高干的传奇形象。

另一篇令我感动的散文是丹增的《生命的意义》,文章描写了西藏自治区党委原第一书记阴法唐。其中有这样一个细节:“一次听说他的夫人来了,我按照藏族习惯,带上一壶酥油茶和干奶酪登门看望。阴书记看到我提的东西,既惊讶又有点为难,他说:‘我们都是班子成员,不用这么客气。’我临走时,他把夫人带来的北京特产大包小包装了一袋让我拿回去……”一壶酥油茶怎么能跟“惊讶”联系在一起呢?对此,丹增的解释是:“他在西藏工作,从不收任何人送的烟酒等礼品,更不用说钱物,也不与政界商界请客吃饭。这些今天看来不合乎寻常的举动,他们这辈看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他们这辈人的心里只是自我牺牲,而没有一丝一毫的索取欲望。”作为藏族干部、藏族作家,丹增佩服这样的共产党人,他总结道:“只有这样无私地活着,为人民服务,生命才有意义!”

王巨才《父老乡亲》一文中描述的马文瑞,1930年在陕西任县委书记。白色恐怖下,他扮作小商人,肩上背个“茂源号”褡裢,走街串乡,领导地下共产党员们发动群众抗粮抗捐,铲除匪患恶霸,壮大革命力量。毛泽东曾亲自为之题写“密切联系群众”奖状。新中国成立后,已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马文瑞,有一次到延安视察,当年的山西老乡闻讯赶去,想要跟曾经同生共死的老马见上一面,结果被保卫人员挡在宾馆门外。马老事后听说此事,心情非常沉重,感叹道:“哪有共产党人怕群众的道理!”文章借古喻今,发人深省。

叶廷芳的《性情何其芳——纪念恩师何其芳百年诞辰》、孙郁的《他以为自己是这个通道的敲门人——1987年汪曾祺在美国》、张颐武的《“痴”与“才”——追怀周汝昌先生》,写出了中国老一辈知识分子的共性,那就是“天真”二字。即使境遇惨淡,即使走到巍巍老年,也不失一颗做君子、读经典、作学问的心。正是这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文人传统,代代年承,使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薪火相传,五千年仍郁郁勃兴。

冯立三和彭影明笔下的母亲,则都是普通劳动妇女,在她们身上,同样体现着中华民族最可宝贵的传统美德。她们慈悲、善良、牺牲自我、忍辱负重,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是家庭的顶梁柱,子女们有了她们就有了钢铁的脊梁。

常态性散文佳作频出

无可讳言,我国的散文创作中数量最大的还是常态性的散文,2012年,这一领域同样收获了一批佳作。

王蒙的《文化瑰宝与文化泡沫》开宗明义,提出关系中国文化向何处发展的重要问题:“在全社会关心并期待文化事业的发展与繁荣的情况下,文化事业有可能出现很好的态势,有可能产生无愧于伟大时代与悠久传统的文化瑰宝,也有可能稀里糊涂地、或抱着侥幸心理装模作样地打造文化的泡沫。”接着,他一一指出什么是“文化泡沫”:“以文化的名义圈地、抢滩、贷款。到处修建文化生态园、文化纪念园、文化名人园、文化基地、文化广场……”“再如在一个大型运动会的开幕式上,出现大量认真的与杜撰的文化符号,把早已经失传的中华乐器奇形怪状地批量展现出来,这固然十分吸引眼球,这固然是大导演的虚构的权利,却不能认真地以为只要奇特、神秘、巨大、古老就是真正的中华文化。”“更大的泡沫是走文化的过场,将文化活动的规模、大花文化的经费,却忽视了文化的灵魂。晚会举行了,歌舞演出了,著名艺人来了几十几百,观众成千上万,收视率也极高,演出运用了多种现代高科技手段,出现了许多‘卖点’;然而没有思考,没有头脑,没有热情,没有爱憎,没有臧否,没有深度,没有教益,没有精神的营养也没有感情的充盈与升华。”这些现象,充满了我们的社会生活,因了打着“文化”的幌子而使民众有所迷惑。王蒙焦急地指出:“这样的文化是空心文化,是无灵魂的苍白的文化,是文化的悲哀。”作者以此提醒大家警惕伪文化、假文化、发财文化、邀奖文化的继续衍生与横行。

同为随笔,穆涛的《旧话重提》呈现了另一种风格:半文半白的文字,曲里拐弯的臧笔,幽默之中的枪尖快棒,仿佛一个高智商的测验,跟得上跟不上看你的道行深浅。这也是穆涛的一贯风格,和他的聪明度成正比,也从一个侧面绚烂着当代散文创作的百花园。

葛水平的不是在天堂门前说话》一文,让我想起楼肇明曾说过,散文创作最重要的是“感觉”。单从题目,你能想象这是一篇写石雕的文章吗?把“天堂”与“石雕”联系起来,这“感觉”是多么奇特,再加上飘逸机巧的文字,读罢,你的心中不可能不激荡起艺术炫美的涟漪。

陈世旭的《惠州烟雨》《贵州的水》《苍天般的阿拉善》等,体现了他诗意化的文字特点。每一句都是诗,组合起来又比诗更加天大地大,云卷云舒,好似一条宇宙飞下的白练,在蓝天白云的映照下汲满金色的曙光,然后以音乐的激越旋律直击人的心灵深处,回声经久不息。

赵丽宏的《记忆和遐想》中,既能找到典雅和精致,也能看到外国散文的冷静表述与悠长哲思,甚至还能看到近年来“新新散文”的灵光闪现。赵丽宏把最新鲜、最光彩的写作经验吸取过来,不断变换着写作的笔法,不断尝试着文字的创新,“语不惊人死不休”,一次次把自己涅槃成新生的火凤凰。

2012年,少数族族作家的散文创作也不乏星光。藏族作家江洋才让的《康巴笔记》踽踽独行,执拗地追寻着大地灵魂、山峰的纯真和生活中的禅意,提醒我们在科技文明的喧嚣中别忘要做一些停留,反思一下人生的真谛。裕固族作家 Y.C.铁穆尔的《夏营地·夏营地》,通过写给女儿的一封信,表达了对家乡草场被随意承包开矿、滥挖滥采的愤懑,以及对自己无能为力阻止的痛彻心扉。

2012年的好散文还有不少,如陈忠实描写地域文化的《白鹿原上奏响一支老腔》,陈歆耕批评文坛不正之风的《痴人呓语》,王彬呼吁环境保护的《宙斯的礼物》,李元胜记录可爱动物的《昆虫之舞》等等,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无法一一展开评论。

2012年散文创作:

爱,思辨与救赎

□纳 杨

近年来,关于散文文体特征的争论一直不断。有人认为散文是一种没有边界的文体,也有人认为散文沦为“文字收容所”,任何不能归入其他文体的文章都可归入散文。实际上,在所有文体中,散文的确是最庞杂的,这主要表现在:主题内容无所不包、创作者数量庞大、读者广泛。这样看来,散文确乎会因为没有可视的“边界”而失范,但我认为,散文有一点是最要紧的,那就是情感因素,或者叫个人生命体验。在小说里,情节是推动故事发展的关键;在诗歌里,韵律是构成诗句的规律;在戏剧里,人物关系是展示戏剧冲突的抓手;而在散文里,情感是构成散文内在规律的惟一逻辑。以2012年出现的散文作品为例,可以看到,好的散文给人带来的是心灵与心灵的沟通交流,是精神对话的享受。这种对话,可以是愉悦的,比如爱;可以是启发性的,比如思辨;可以是冲击性的,比如救赎。

长篇散文：一种新的写作途径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大散文蔚然成风,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对传统散文创作形成审美冲击。

2012年有3部长篇散文值得关注,在艺术上有新意,代表着长篇散文不同的创作方向。一部是彭学明的《娘》,可以说开启了一种新的散文写作方法,但作品本身很难复制。《娘》这部建立在回忆基础上,完全由散文手法写成的长篇文章,既不同于散文集,又不同于回忆录。其中使用了一些小说手法,但读起来又和小说不同,这是因为,使一段段回忆连缀起来的,不是情节,不是人物,而是作者对母亲的拳拳真情,这情理有爱、有悔、有悟,还有感动。《娘》里最让人感动的不是母亲对儿子不计回报的爱,而是儿子在永远地失去母亲后回忆与母亲相处的种种经历,幡然醒悟母亲对自己的疼爱、保护以及无力保护的无奈和无力。虽然这醒悟来得太迟,已无法弥补,但作者把这醒悟写出来,是与读者分享,也是对读者的警醒。这种深入骨髓的自我剖析和反省,正是文学作品能够带给人们精神力量的源动力。这样一部超常规的散文作品,是在作者的苦心经营下逐渐丰满起来的。这部长篇散文最初在期刊上发表6万多字,后来扩充到15万字,最终出版的全本20万字,可以说是一步步精打细磨而成的。儿女与父母的感情是文学书写的永恒话题,母亲的形象也是散文作品中一再出现的。每一位母亲都有与众不同的故事。《娘》在“母亲”这一永恒的主题上进行深度挖掘,融合了作者对亲情、友情、爱情的深刻体验,使这部长篇散文读起来饱满、新鲜而又引人深思。

另一部重要长篇散文作品是李娟的《羊道》系列:《羊道:春牧场》《羊道:前山夏牧场》《羊道:深山夏牧场》以及《冬牧场》。这是作者与一户哈萨克牧民共同生活、历经寒暑跋涉后,在几年时间内陆续写下的文字。作者用一种哲学意味的心灵,体味这支也许是世界上仅存的、真正意义上的游牧民族的生存状态;以自己的切身感悟,向读者讲述了这样一种与自然生死相依,虽历尽艰辛、苦难而又自得其乐、充满生之自由的古老生活。《羊道》打动人的,不仅是人们所不熟悉的生活带来的新鲜与刺激,更是作者在叙述中表达出的真切的个人生命体验,对生活本真的思考、对人类社会意义的启示。在都市化程度越来越高的今天,人们与大自然的越来越远,享受自然成为许多人所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散文中对寂静的山林、无人地带的孤独的书写,为人们带来了梦想的生命体验。而作者却认为“所有的文字都在强调他们的与众不同。而我,我更感动于他们与世人相同的那部分。那些相同的欢乐,相同的忧虑与相同的希望”。这样一种思辨的情绪,配上与众不同的生活,使得这部长篇散文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还有一部非常有特点的长篇散文是郭严贵的《和春天一起来到映秀》,这部以广东东莞对口支援“5·12”汶川特大地震震中映秀镇的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为题材的长篇纪实散文,是以散文形式表现国家重大题材的一个新尝试。散文创作涉及重大题材是有积极意义的。任何文体都应该与时代发生联系,否则只能在故纸堆里挣扎,不见未来。当今中国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人们的生存环境和思想领域都在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革,这些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深邃的思考对象和写作

素材。散文这种以情立命的文体,在这个思想变化极大的时代更应该也有可能抒发出大时代情怀。《和春天一起来到映秀》可以说为长篇散文创作提供了一种富有启发性的书写范式。擅长写小说的郭严贵选取了散文的形式,同时用小说的构思来布局全书,将书写重点放在灾后重建胜利完成之后,人们的心灵书写上。书中不可避免地谈到痛苦,但阳光、鲜花、微笑、爱意、感谢、新生、希望等才是全书的主题。作者把自己在映秀感受到的人们通过辛勤的劳动,一扫灾难带来的阴霾,全心全意地迎接新生活的热情,通过这样一种书写,让读者仿佛感同身受,体会到经历浩劫之后的重生之艰难,也更加懂得生之可贵。作品写出了当代中国人面对大灾大难不灰心、不放弃、勇拼搏、共患难的时代精神。

人物肖像：每个人都有独特之处

写人,历来是散文中的一个重要主题。用回忆的方式记叙亲人、朋友,在叙述与他们的相识相交的过程中,表达的是作者的思想情感,而读者则可以倾听作者的诉说,感悟人生。

李存葆的《一墨斋主》刻画了军旅画家李翔的成长史。青少年时代的困厄和不幸没有阻挡他在书画艺术上刻苦求索,天赋和勤奋最终使他成为当代著名画家。这样一个带有传记色彩的散文作品里融入了作者对青年成长道路的思考,也展现了作者对国画艺术的精妙阐释,读来很受启发和激励。

韩少功的《一个伪成年人》在写人的同时表达了对现实世界的一种戏谑式的批判。大田在作者眼里是一个难以承担任何成年人身份的人,他的内心永远是一个淘气的孩子。这样一个人在社会上折腾了很久都没成功,最终“在艺术圈出没”,颇具讽刺意味。但是,大田有一点是可贵的,那就是对自己内心的诚实。他可以全然不顾世俗的眼光,只要像小孩子一样到处弹奏自己的畅想。只是这样的人对社会的贡献,似乎也不能用惯常的标准来衡量。

郭文斌的《大山行孝记》很少见地把目光对准晚辈,写儿子如何孝顺自己和自己的父亲。文中写到的儿子的种种孝行真切感人,也激发了读者探寻这样一种可贵价值观的形成原因。孝道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散发人性光辉的美德。《大山行孝记》让我们看到了建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理想社会的希望。文章在写儿子的孝顺的同时,也在梳理儿子对自己产生的影响,反映出年轻一代和父辈在世界观、价值观的形成上的相互作用。

石彦伟的《三姓街大院的流年碎片》不是以写人为主,但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却是几个记忆中的人物:姥姥、回妈、马娘,这些见证了三姓街流年碎片的老人,对于生活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对于人生也有着不同的应对方式。作为年轻作者,石彦伟在写作中表现出对生活的沉潜和细致体察,使他的文章有一种生活自流淌的感觉,值得称誉。

历史记忆：散发钻石光芒的人生

一些散文从自身体验的角度去叙述历史,讲述历史人物的悲喜,从某种角度还原历史真相。这类作品往往带有强烈的史实性,是我们了解历史的另一个途径。

贺捷生的一系列回忆散文在圈内引人注目。《热血还在奔流》在围场骑马投笔》《太阳下的赤子——忆胡乔木同志》等,不仅让我们看到一些历史面目,更写出了贺龙、胡乔木等重要历史人物的生活气息,拉近了当代人与历史人物的距离。臧小平的《回忆我的父亲母亲》截取了大诗人臧克家三首诗背后的故事,以及臧克家夫人养花的几个生活片段,写出了作者对亲人的怀念,也让读者对诗歌写作有了一些领悟。

侯健伟的《回鹿山》以十多万字的超常篇幅回忆父亲不平凡的一生,父亲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次生命洗礼,选择回到家乡回鹿山做普通乡民,却始终因谜一般的身世和讲不清楚的战争历史,摆脱不了一连串的厄运。作者细密而深情地叙述了与父亲相处的种种感受,从恐惧到迷恋,从疑惑到排斥,从反抗到绝望,最后醒悟了理解了却已无法倾诉。这部作品不仅写出了回鹿山这个地方纷繁复杂的社会面相,更把父子两

代人之间沟通困难的症结一一理清、解开,使人掩卷长思。

周同宪的《一个人的编年史》构思新颖。以年份为断点,写下自己记忆中的往事的同时,也记述了那些年代里人们的真实生活。个体的历史记忆可以让僵硬的历史变得有血有肉。虽然每个人的感受千差万别,对历史的记忆也会有出入,但倾听别人内心的真实感受,总是会有收获的。

南帆的《饥饿惯性》本意是想写自己在当知青时期亲历的一个用“饥饿”当“武器”在与农民对抗中取胜的故事。作者没有直接去讲述这个故事,而是先写关于“吃”的所知所思所感,慢慢引出知青时期关于饥饿的记忆,最后才写出那个郁积在心中多年的故事。文章其实是作者心路历程的倒叙,在“胜利”以后,作者一直在思考这样的做法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震慑力,于是才有了关于“饥饿”的这些深刻的理解。作者是位理论批评家,他所写的散文也带有明显的理论思辨色彩。文中关于“吃”的思考很有意思。“吃喝的知识无限丰富,但只能逗留在日常世界,摆不上台面,无法打动哲学。”“无数知识青年振振有词地背诵着豪迈的词句奔赴乡村,直至在饥肠辘辘中丧失了全部的激情。”这样视角独特、感受新颖的句子在文中还有很多。

此外,葛永平的《我走过时间》、小米的《电影往事》、帕蒂古丽的《我们在稻谷上睡了一个冬天》等都是写自己的亲身经历,分享各自独有的生命况味,从这些作品可以了解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变迁。

还有一类历史文化散文,记述的是作者通过阅读看到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用想象还原历史场景,评述历史人物,抒发情怀。耿立的《秋瑾:襟抱谁识?》讲述的是作者从史料中看到的民国革命英雄秋瑾的事迹,经过作者思想的过滤,写出了那个国弱民贱的时代,革命者不惧死而惧世人的悲凉。在作者看来,当时仁人志士实现爱国救国壮志有两条不同道路,一条是以秋瑾为代表的以死对敌,唤醒国人的热血救国道路,另一条是以鲁迅为代表的,“另一个更加荆棘和坎坷的路途”。似乎受到了“比女人多了男子气,比男人多了英雄气”的秋瑾的影响,整篇文章充满了激昂的情绪,仿佛一阵催人奋进的号角,激荡着人们的心胸,为革命者唏嘘,更抨击了那些把历史当作小姑娘随意打扮的人的行径,还原历史人物的真实面目。

熊育群的《边地所城》写的是明朝朱元璋在广东沿海修建海上长城——所城中的大鹏所城的历史,而这座大鹏所城就是深圳的前身。作者站在大鹏所城的城墙遥想如今已被遗忘了的当年数万甚至几十万人参与的巨大工程,思古望今,思绪万千。文章大气而又敏感,很有气势。

异域文化：可资借鉴的他山之石

2012年还有一类散文很值得关注,那就是书写异国风情、文化的散文。这类作品往往是作者在异国他乡切身感受。不同于一般的游记,这类散文的重点不是凸显不同文化之间的激情与碰撞,而是沉下心来,仔细品味他国文化的底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我们弘扬中华民族两千年的深厚文化的时候,花些心思去了解研究其他古老文明的生存现状是很有必要的。

陈宇欣的散文集《我就是想停下来,看看这个世界》在年轻人中流传颇广。作者是位“80后”女孩,22岁休学,选择了边挣钱边游走世界的行走人生,希望在了行走中找回真实的自己。正是在有了这样与与众不同的生活,才有了这样一部与众不同的散文集。作者用直白的语言记录了自己独自一人到西伯利亚、莫斯科、芬兰、北极等地旅行的种种经历和见闻。不管面对的是顺利、高兴,还是意外、困难,她都用乐观的心态去积极应对。读这样充满青春活力和令人积极向上的文学作品,给人能量,让人愉悦。

其他让人印象比较深刻的散文作品还有李佩甫的《我怀念》,廖一梅的《像我这样笨拙地生活》等语言精致、感受真切的传统抒情小文。这一类型的散文作品目前还占据散文写作的主流。而像冯唐的《三十六大》、纳兰妙殊的《粉墨》、韩寒、柴静的博客文章等别致新颖的散文作品,虽然现在还不是主流,但这些年轻者在语言风格、关注视角等方面对读者有强烈的吸引力,使他们的作品越来越受关注,相信日后会在整个散文写作格局中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